

□刘永加

挑菜节起源于唐代，白居易洛阳踏青

在唐宋时期，还没有“龙抬头”这个节日。“挑菜”的风俗始于唐代，唐李淳在《秦中岁时记》中说：“二月二日，曲江拾菜士民极盛。”春季到来，原野里野蔬遍地。此时人们要吃到新鲜菜蔬，势必要到野外挑菜。因此唐代就把挑菜的活动固定成一个节日，名曰“挑菜节”。之所以被放在二月初二，是因为此时虽然数九还未结束，可地气已经回暖，野菜正在悄然返青发绿。在诗人笔下，挑菜节也被叫做“挑菜日”“挑菜时”，唐诗人郑谷《蜀中春雨》一诗写道：“和暖又逢挑菜日，寂寥未是探花人。”唐诗人刘梦得《淮阴行》诗也写道：“无奈挑菜时，清淮春浪软。”这两首诗一个在蜀中，一个在淮阴，可见当时挑菜节的普及。而白居易所写的《二月二日》一诗，生动展现了洛阳二月二挑菜节的盛况：“二月二日新雨晴，草芽菜甲一时生。轻衫细马春年少，十字津头一字行。”渡口满是拥挤上船或下船的青年男女，有的成双结对挑菜归来，有的则是迎送回娘家的媳妇，充分说明当时洛阳的挑菜节有多热闹。

这里的十字津头，指的是洛阳城西南天津桥头的窈娘堤，唐代孟棨《本事诗》记载：窈娘是武则天时左司郎中乔知之的女婢，貌美善歌。挑菜节时，窈娘与女伴骑马到郊外春游，被武承嗣抢去。乔知之愤痛成疾，在细绢上写一首《绿珠怨》，用重金买通武的守门人，送给窈娘。窈娘得此诗，羞愤难言。次年挑菜节，窈娘陪武承嗣在洛浦游春之时，投洛河自尽。后人哀之，将这段河堤称为窈娘堤，每年挑菜节在此凭吊窈娘。

当时，白居易还与刘禹锡、元稹等人重游窈娘堤，白居易有感而发，咏出名作《天津桥》：“津桥东北斗亭西，到此令人诗思迷。眉月晚生神女浦，脸波春傍窈娘堤。柳丝袅袅风缲出，草缕茸茸雨剪齐。报道前驱少呼喝，恐惊黄鸟不成啼。”大诗人刘禹锡也不甘落后，写下了《同乐天和微之深春二十首》，其中写道：“何处深春好，春深羽客家。芝田绕舍色，杏树满山花。”“何处深春好，春深小隐家。芟庭留野菜，撼树去狂花。”白居易一行在山野村头，挑菜、踏青、饮酒、赋诗，好一段“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让仕宦途中屡遭劳顿的他们难得偷来半日闲。

宋代宫廷搞有奖竞猜，欧阳修把酒洛阳

到了宋代，“挑菜节”更是深入人心。北宋贺铸《二月二日席上赋》一诗写道：“仲宣何遽向荆州，谢惠连须更少留。二日旧传挑菜节，一樽聊解负薪忧。”由此诗可知，到北宋时，二月二已有传承的节日了。北宋大诗人苏轼作为美食家，怎能放过鲜美的野菜，于是他亲自下地挑菜，并写下了词句：“拄杖闲挑菜，秋不见人。殷勤木芍药，独自殿余春。”

写挑菜节用情最为深挚真切的当数北宋张耒的《二月二日挑菜节大雨不能出》：“久将松芥芼南

羹，佳节泥深人未行。想见故园蔬甲好，一畦春水转辘碡。”因雨不能出去参加挑菜节，回忆故园的蔬菜香，也是一种享受呀！

北宋时，洛阳是为西京，文人们会聚一处结社交游，吟咏诗词。宋仁宗天圣九年（1031年）初，欧阳修任西京留守推官，与尹洙、梅尧臣、杨子聪、张太素、张尧夫、王几道结为“七友”。这年的二月初二，欧阳修等七人到洛阳东郊踏青挑菜，饮酒赋诗。欧阳修首先作词《浪淘沙》：“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垂杨紫陌洛城东。总是当时携手处，游遍芳丛。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感慨洛阳早发的玉兰、迎春花迎着东风开放，其实更是感慨自己的人生。接下来，众人各以挑菜节为题赋诗，梅尧臣则祭出《和挑菜》诗：“中圃本膏壤，始觉气候偏。出土蓼甲红，近水芹芽鲜。”梅尧臣诗中提到多种蔬菜，除芹菜外还有蓼甲，即蓼菜芽。

到了南宋，挑菜节更盛。陆游《水龙吟·春日游摩诃池》写道：“挑菜初闲，禁烟将近，一城丝管。”而贺铸《凤栖梧》也不甘示弱：“挑菜踏青都过却，杨柳风轻，摆动秋千索。”如此众多的诗词唱和挑菜节，可见民间挑菜节的普及。

其实，此节盛行还源于宫廷的推波助澜。宋周密在《武林旧事》中记述，二月初二这一天宫中有“挑菜”的御宴活动。宴会上，在一些小斛（口小底大的量器）中种植生菜等新鲜菜蔬，把它们的名称写在丝帛上，压放在斛下，让大家猜，根据猜的结果有赏有罚。这一活动既是“尝鲜儿”，又有娱乐，所以当时“王官贵邸亦多效之”。

元以后“龙抬头”渐成节日，老北京人忌动针线

不过，唐宋时期的“二月二”活动并没有和“龙抬头”联系在一起，直至元代，二月二才明确有了“龙抬头”的说法。元熊梦祥《析津志》记载大都（今北京）的风俗时说：“二月二，谓之龙抬头”。这一天人们盛行吃面条，称为“龙须面”；还要烙饼，叫作“龙鳞”；若包饺子，则称为“龙牙”。之所以叫“龙抬头”，因为农历二月初二正值“惊蛰”节气前后，此时天气渐暖，一些昆虫小动物好似被春天的阳光和春雷从睡梦中惊醒了一般。春回大地时，人们希望龙出来镇住一切有害的毒虫，也寓意期盼丰收，这就是“二月二，龙抬头”说法的来历。

明朝时，在二月二还增添了“熏虫”“炒豆”等活动。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载：“二月二日曰龙抬头……熏床炕，曰熏虫，为引龙虫不出也。”《大兴县志》则记载，“二月二，家各为荤素饼，以油烹而食之，曰熏虫。”

清代二月二“龙抬头”活动更为密集。在北京的民间，二月二有很多习俗，比如说“二月二，照房梁，蝎子蜈蚣无处藏”。老百姓要在这一天驱除害虫，点着蜡烛照亮房梁和墙壁以驱除蝎子、蜈蚣等。民间饮食也如前代一样，多以龙为名，以取吉利，而且这一天妇女忌动针线，为的是免伤龙的眼睛。

由此可见，从元以后“挑菜节”就被“龙抬头”取代，直至今日罕有人提起“挑菜节”了。

（本文作者为枣庄市台儿庄区融媒体中心编审委员会编审、文史学者）

【短史记】

挑菜节与龙抬头

每年农历二月初二被称为“龙抬头”，又被称为“春耕节”“农事节”“春龙节”。俗语说：“二月二，龙抬头，大家小户使耕牛。”此时阳气回升，大地解冻，正是春耕备耕之际。在唐宋时期，二月二被称为“挑菜节”，诸多诗人挥毫赋诗，留下了宝贵的节庆资料。



扬州宝应蒲松龄游幕宝应纪念馆

□李清

清朝文学家蒲松龄（1640—1715），其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凭借奇幻诡谲的故事、细腻入微的笔触名满天下。蒲松龄自幼聪慧，19岁时接连考取县、道、府三个第一名，名震乡里。然而，蒲松龄此后多次参加省试屡屡受挫，直至71岁才成为贡生，大半生的时光都在家乡，以塾师为业。

年长蒲松龄九岁的同乡孙蕙，康熙八年获任江苏扬州府宝应县知县。次年秋天，蒲松龄应孙蕙之邀，南下宝应担任幕宾，协助处理文牍事务。这一趟扬州之行，也成为蒲松龄人生中唯一一次远赴他乡的游历。在宝应担任幕宾的近一年间，蒲松龄倾力协助孙蕙操办政务，当时地处淮河下游的宝应县地势低洼，运河大堤时常溃决，蒲松龄心怀悲悯，为孙蕙出谋划策，主张开仓救荒，又敦促疏河工程加快推进。

宝应当地产有一种味美鲈鱼，这本是大自然的馈赠，却成了县府“甜蜜负担”。达官贵人纷纷以品尝官塘鲈鱼为快事，县府衙门为此疲于应付。蒲松龄劝说孙蕙巧除史弊，提议将官池改为放生池，在池边设立放生池碑，并亲自撰写了《放生池碑记》，他引经据典，以心怀大德、不轻易杀生的典故，劝谏官员体恤民情、珍惜民力。这一做法，成功为县府解除了“鲈鱼之患”，爱民惠举一时传为美谈。

据传，蒲松龄在宝应游幕期间，当地人时常能见他身披麻袋、手执笔墨出没于大街小巷。他漫步于泰山殿、孔庙、八宝亭等地，沉醉于历史的韵味与文化的气息之中，又涉足“九里一千墩”汉墓群、松岗等荒野之地，探寻着岁月留下的神秘痕迹。生性开朗的他喜与人交谈，每听闻有趣的事便记录下来，这些奇闻逸事不少都成为《聊斋志异》中那些奇幻篇章的灵感源泉。

如今，在宝应县衙门遗址东侧，蒲松龄曾经居住过的两层小楼的三合院被辟为蒲松龄游幕宝应纪念馆。一楼设有“鹤轩流芳——蒲松龄游幕宝应见踪”主题展厅，一尊蒲松龄半身铜像静静伫立。二楼东西两侧的厢楼是蒲松龄当年办公、创作的地方。此外还建有“鹤苑”，巧妙引用蒲松龄游幕宝应相关的鹤轩、鹤亭、鹤泉、放生池碑记等元素以及蒲松龄故居藤廊等人文景致，别具一格，独具情趣。

蒲松龄还在扬州高邮工作生活过。高邮的孟城驿始建于明洪武年间，是我国目前保存最为完好、规模最为宏大的古代驿站。在运河水运繁荣的年代，这里是繁忙的物流枢纽，大量货物通过大运河运抵孟城驿，又有条不紊地分发到周边各地区，南来北往的官员也纷纷在

在扬州城至高邮途中，要经过大镇邵伯。蒲松龄途经此地时诗意图大发，留下两首吟诵邵伯湖的诗作。其中，《泛邵伯湖》洋洋洒洒16句112字，将邵伯湖的水韵风姿描摹得淋漓尽致，“湖水清碧如春水，渔舟棹过沧溟开。夕阳光翻玛瑙瓮，片帆影射琉璃堆。”清澈的湖水也让他的心胸变得澄澈宽广，“游人对此心眼豁，拍案叫绝倾金垒。”天色渐晚，他还舍不得离开邵伯湖，“烟色苍苍日色暮，欲行且止犹徘徊”，眷恋之情溢于言表。

蒲松龄南游任幕宾，满打满算仅仅一年，可这一年于他而言，却满是苦涩与无奈。“布帆一夜挂东风，隔岸深深渔火红。浪急人行星汉上，梦回舟在月明中。隔年恨别看春树，往事伤心挂晚钟。世事于今如塞马，黄粱何必问遭逢！”为人当幕宾，于他心心念念的科举之业毫无助益。眼看下一年又逢乡试，实现梦想的契机不能错过。康熙十年秋，尽管孙蕙一再挽留，他决意辞幕北归，留下《鹤轩笔札手稿》《南游诗草》和多篇书信文告，带着未酬的壮志，踏上了北上返乡的归途。

蒲松龄的扬州一年，有初到宝应时的意气风发，有为民解忧的善举佳话，有游历四方的诗意图洒脱，也有遭受挫折的黯然神伤。这一年，宛如一场五味杂陈的人生旅程，融入了他的生命长河，成为《聊斋志异》之外另一部值得后人细细品味的“人生奇书”，让我们得以窥探这位文学巨匠别样的人生片段，感受到他的才情、胸怀与无奈。